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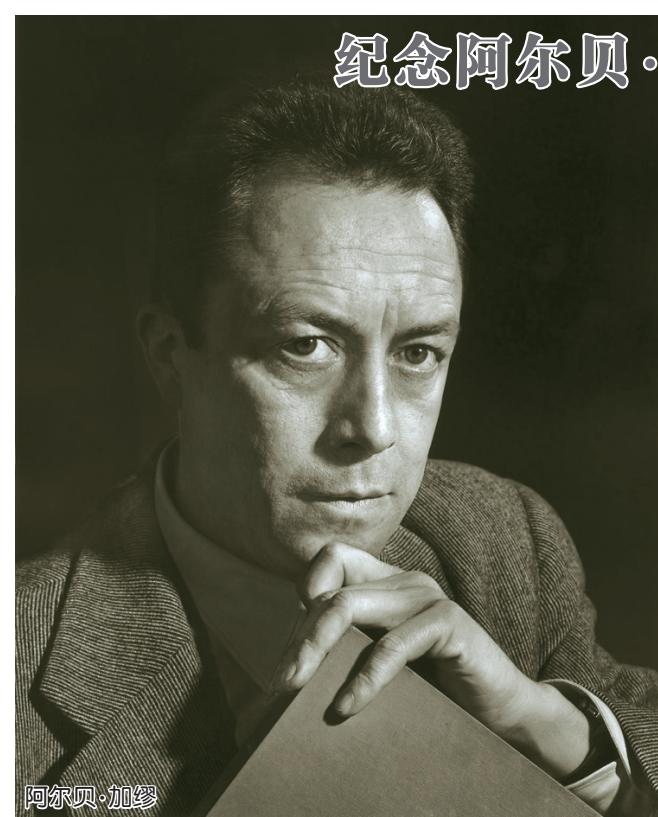
今 年是阿尔贝·加缪诞生100周年，也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第53年。1960年1月4日他因车祸去世时年仅46岁，在此之前3年，未满44岁的他已经成为了继吉卜林之后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出生在阿尔及尔贫民区的穷孩子，这个不到一岁就失去了父亲的战争孤儿，这个母亲是文盲和女佣、舅舅是制桶工人的法国下层移民的后代，在投身文学创作25年后，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缪在20世纪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就文学的独创性贡献而言，他的小说《局外人》《鼠疫》《堕落》《流亡与王国》(中篇集)《第一人》，随笔集《反与正》《婚礼》，戏剧《卡利古拉》《正义者》等都是极富特色的杰作，具有很高的艺术质量。

就思想的深刻性而言，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乃至欧洲知识界盲目混乱的整体环境中，加缪和汉娜·阿伦特、乔治·奥威尔一样，是少数始终保持着清醒头脑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今天，历史已经证明了加缪思想的正确性。无论在对待现代虚无主义问题上，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问题上，在对待苏联体制和极权主义问题上，在对待阿尔及利亚问题与恐怖主义问题上，他所表现出的独立精神、远见卓识以及坚持真理的道德勇气，都超越于同时代那些屈从于乃至盲目鼓吹各种左右翼意识形态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之上。

加缪思想的可贵和深刻之处在于：他始终拒绝虚无主义，始终坚持对人的信念、对生活的热爱。他由衷地赞美这个世界和生命的美好，但是对于世界的阴暗面，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从不盲目乐观。这种态度正是他在《反抗者》中所推崇的“地中海思想”的精髓。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加缪始终坚持为人生而艺术。这个从阿尔及尔贫民区成长起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生关注的是世界上的苦难和对真理的探求，而不是自己作为作家的名利与虚荣。他一生追求的是真理本身，而不是同时代知识分子很容易陷入的左翼或者右翼的意识形态，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价值。

《加缪传》(1996年)的作者奥利维耶·托德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曾经与萨特圈子里的人过从甚密，加缪当时是不受那个圈子的人欣赏的。后



阿尔贝·加缪

盲目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关于苏联阵营还是阿尔及利亚问题，历史都证明了加缪的正确性。当一切仇恨化为云烟，加缪如今已成为法国文学中最受人喜爱的作家之一。”

加缪思想的可贵和深刻之处在于：他始终拒绝虚无主义，始终坚持对人的信念、对生活的热爱。他由衷地赞美这个世界和生命的美好，但是对于世界的阴暗面，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从不盲目乐观。这种态度正是他在《反抗者》中所推崇的“地中海思想”的精髓。

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加缪始终坚持为人生而艺术。这个从阿尔及尔贫民区成长起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生关注的是世界上的苦难和对真理的探求，而不是自己作为作家的名利与虚荣。他一生追求的是真理本身，而不是同时代知识分子很容易陷入的左翼或者右翼的意识形态，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价值。

《加缪传》(1996年)的作者奥利维耶·托德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曾经与萨特圈子里的人过从甚密，加缪当时是不受那个圈子的人欣赏的。后

## 纪念阿尔贝·加缪诞辰100周年

# 百年之后重识加缪

□黄晞耘



来，托德对加缪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潜心研究，出版了一部厚达855页的精彩传记。随着对加缪了解的加深，托德最终变得很喜欢加缪，他意识到加缪“不仅仅是个道德高尚的人，而且是个诚实正直和勇敢的人”。

思想家阿兰·范基库特于1987年出版的《思想的失败》一书曾经在欧美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范基库特对加缪的认识，也经历过一个与奥利维耶·托德相似的过程。年轻时的他无法真正理解《局外人》的内涵，读这本书时感到更多的是“恼火”，而觉得《鼠疫》“有说教味，文笔沉闷，但同时也非常感人”。后来他和奥利维耶·托德一样也逐渐开始懂得欣赏并喜欢加缪，“读《反抗者》时我发现了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多年来范基库特一直在思考一些他认为正在受到威胁、应该全力捍卫的基本价值，而加缪的思想引起了他深深的共鸣与敬佩。

对于中国知识界和一般读者来说，阿尔贝·加缪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熟悉是因为这个名字与著名的荒诞哲学和《西西弗的神话》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局外人》《鼠疫》等作品作为20世纪法国文学的经典，在中国早已脍炙人口。陌生是因为我国知识界和一般读者对加缪的了解不仅非常有限，而且存在一定的误区。例如，常常被认为是加缪主要思想的荒诞哲学其实仅仅是一个出发点而已，他最重要的思想论著不是早期的《西西弗的神话》，而是1951年出版的《反抗者》；他真正重要的思想不是荒诞哲学，而是既拒绝上帝信仰、又拒绝价值虚无主义的“人间信仰”和人道主义思想，以及成熟时期关于“反抗”和“地中海思想”的深刻论述。

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将加缪的思想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混为一谈。事实上，除了无神论这个共同的起点以外，加缪和萨特思想的指向以及终极目的都大相径庭。萨特从否定上帝的存在走向了否定一切先天永恒的价值原则，走向了价值虚无主义。在他看来，没有先于存在的本质可言，因此也没有先于存在的永恒价值，无论是上帝、人性还是永恒的善。“随着上帝的消失，一切能在理性天堂内找到价值的可能性都消失了，任何先天的价值都不复存在

了”，人先于其本质而存在，然后在自由的行动选择中决定自己的本质和存在价值。

与萨特截然相反，加缪没有从否定上帝的存在走向彻底否定一切先天永恒的价值原则，对于价值虚无主义，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种清醒是他身上最为可贵之处，也是他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高于许多职业哲学家的地方。他清醒地意识到从无神论出发绝不能走向彻底否认一切先天的价值原则，因为，没有了永恒的价值原则就没有了任何的底线，这样的逻辑一旦贯彻到底，那么对生命权利的剥夺、对人的尊严的践踏都将是许可的，这恰恰就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许多自以为真理在握实则盲目幼稚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所不愿正视的苏联社会的现实。

再如，无论对于加缪的生活、思想还是文学创作而言，阿尔及利亚都具有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我国读者对于这个重要方面至今仍然非常陌生。加缪的师长兼朋友让·格勒尼耶曾经强调指出：“要谈论阿尔贝·加缪，也许首先应该提到阿尔及利亚，

这不是要用他的故乡来‘解释’他，而是因为他性格中的一些特点只有通过阿尔及利亚才能得到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阿尔及利亚的语境根本就无法说明和理解加缪的思想与文学创作。

由加缪的朋友、著名作家奥利维耶·托德撰写的《加缪传》(参见奥利维耶·托德：《加缪传》，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是一部厚达855页的传记，包括了60页非常翔实的第一手史料征引，是加缪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将这部传记与赫伯特·劳特曼1978年出版的另一部《加缪传》配合阅读，读者对加缪的生平与创作将会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就文学创作而言，作为一个富于艺术独创性的作家，加缪的重要作品远不止《局外人》和《鼠疫》。要真切感受他的精神世界和艺术风格，必须阅读随笔集《反与正》《婚礼》和《夏天》；要深入了解他的思想和价值信仰，必须在阅读其哲学论著的同时参阅他的剧作《卡利古拉》《误会》《戒严》《正义者》；要欣赏他在叙事艺术上的独创性和重要贡献，我们必须知道除了《局外人》和《鼠疫》以外，他的小说创作还有《幸福的死亡》《堕落》、《流亡与王国》中的6个中篇小说《不贞的女人》《叛教者》《来客》《若纳斯》《沉默的人们》《生长的石头》，此外还有他生前未完成的长篇《第一人》。

笔者曾著有《重读加缪》(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着重讨论了加缪精神生命中最重要的四个方面：第一、阿尔及利亚对加缪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第二、既拒绝上帝信仰、又拒绝价值虚无主义的“人间信仰”；第三、关于“反抗”的思想和“地中海思想”；第四、加缪精神历程的艺术表达以及他在文学上的独特贡献。意在廓清一些阅读和理解加缪中长期存在的误区，向读者介绍一个更真实亲切、令人心生敬意的加缪。

我联想到罗布莱斯过去对我亲口谈到的加缪。不过，翁弗莱不曾与加缪有过交往，他在破除关于加缪的传说时，又在制造神话，将之拔高为法国20世纪知识界一位完美无缺的“圣人”。他反复突出加缪“无时无刻不忠诚”，譬如特别“忠于爱情”。这难免会让知情人大笑，觉得他唱的颂歌缺乏几分加缪执著的“真实存在”。因此，评论家马克·里格莱撰文称翁弗莱的所作所为是“败笔”，将不愿为加缪“封圣”的萨特涂抹成“魔鬼”，论据“似是而非”。显然，有关加缪的争论至今仍没有结束。

今岁是加缪诞辰100周年，可加缪被排除在官方确定的应时纪念者名单之外。蓬皮杜文化与艺术中心没有场组织活动，原拟在普鲁旺斯-艾克斯图书城举办的大型加缪纪念展览也停办，对之寄予厚望的加缪之女卡特丽娜接到文化部等方面的停办通知，均未说明缘故。有人提出将加缪从外省卢尔马兰的墓地搬进先贤祠，有关当局不表态。加缪一双儿女都厌恶那座“可悲的怪庙”，说父亲酷爱自由，患有幽闭恐惧症，难在巴黎此等风水的去处安息。他俩都喜欢卢尔马兰，可以自由呼吸。那里山后有大海，大海那边是父亲眷恋的阿尔及利亚。

毋庸置疑，加缪是著作在全球阅读量最广的法国现代作家。据悉，无论在印度和美国，还是在约旦、墨西哥和巴西，都有大量读者在关注他。他是位十分典型的西方意识形态生存主义者。然而，他洞悉西方哲学的缺陷，称之为一个排外的封闭体系，不失为可贵的真知灼见。

## 罗布莱斯与加缪

□沈大力

馆跟罗布莱斯吃饭时，谈及自己的观感。他说改编完全遵照原作的“白描”手法和“内心独白”，采用简洁凝练的文学语言紧扣主人公莫尔索缓慢的心律，用清冷的氛围衬托出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对一切漠然视之的态度。加缪习惯以极其平淡的笔触描绘人物，披露现实，无鼓动读者心潮之意，而是任人去自然感受。这是加缪整个作品的朴素风貌。罗布莱斯告诉我，加缪原来给小说《局外人》起的书名为《冷漠》，意在表明他塑造的是一个飘忽于世外的“自然人种”，完全不同于现实社会中的“异化人”。譬如，莫尔索在小说里对情人玛丽说他不愿去巴黎，因为那是那个肮脏的地方，院落阴沉，人的皮肤苍白等。

一般的现代文论将加缪的思想归入“荒诞哲学”和“荒诞派文学”，罗布莱斯认为这样的论断纯系误读。依

他的亲身感受，加缪有地中海人的气质特征，热爱生活，相信未来，与荒诞派戏剧的代表贝克特、尤奈斯库和品特完全不属于一种思潮。品特声言世界荒诞，命运多舛；贝克特描写人类生活在一个抽象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虚妄；尤奈斯库更引申说虚妄出自人们在痛苦面前的焦虑，坠入乌有之乡。然而，加缪确信：正是生活绝望才导致对生活热爱。他这种信念从1938年写《婚礼》就明显表露出来。所谓“婚礼”，指他与大自然的和谐，加缪赞美了照耀家乡的“艳阳”。正因为如此，罗布莱斯才视他为“太阳兄弟”。

记得1981年一个星期六，罗布莱斯领我去到以法王路易十六弟媳撒丁岛公主萨瓦·玛丽-约瑟芬命名的王妃街，去寻加缪自1950年9月起在巴黎市内的居所。不巧，彼时住在那里的加缪长子让不在家。罗布莱斯指着那幢楼说，加缪1958年还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在蓝色海岸景色优美的卢尔马兰镇另外买房安置母亲，但老母坚持回阿尔及利亚去了。加缪的儿子让是医生，似与文学生涯无缘。负责审读父亲作品手稿，以及处理版权事务的，是他的孪生姐姐卡特丽娜，卡特丽娜花了8年工夫整理了加缪未完成的小说《第一人》勾画难辨的原稿，最终得以按作品原貌出版。

1984年，我应法国外交部邀请到巴黎，在用法文撰写《罗布莱斯与人类的境遇》一书时，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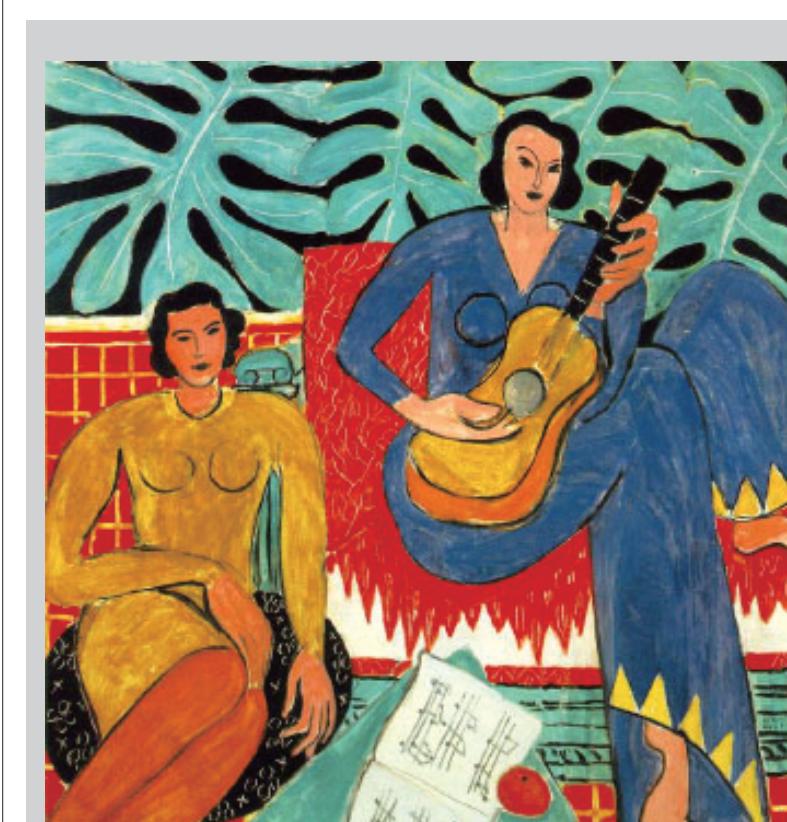
罗布莱斯在布洛涅森林岱达伊街的住所造访，不时又总会聊起加缪。文论著作《1945年以来的法国文学》在论述“存在主义”潮流的章节中认定其代表人物是萨特、波伏娃和加缪。对此，罗布莱斯笑答：“否！”他是加缪的知己，一些看法应该是符合实际而中肯的。他向我回述说，加缪大学毕业论文的主题为“基督教的玄学”，抛弃重理性的神学教条，更不愿以讲原则推论的哲学家自居。他的《西西弗的神话》等作品貌似鼓吹虚无，但“虚无”是个存在主义语汇，表达宇宙中“时空的绝对零度”。萨特标榜“存在主义”，宣称“世界是荒诞”的、惟有“自由抉择”。可加缪并不赞同这种论调。评论家给他贴的“存在主义”标签，恰恰应该为“生存主义”，即一种生活观，并没有萨特、波伏娃等存在主义者们从海德格尔那承袭来的浓烈纯哲学意味。况且，“存在主义”的教父萨特视加缪为异端。加缪发表《反抗者》后，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对其发动猛烈抨击，在遭受萨特和波伏娃等群起攻之的局面下，加缪仍不愿苟同他们的“善恶二元论”，奋起笔战，双方遂公开敌对，达到水火不容的激烈程度。

在法国当代文坛，有分析家还将加缪说成是“新小说”的始作俑者，罗布莱斯觉得此论不当。在他看来，阿兰·罗伯格里耶等鼓吹的“新小说”之“新”，在于抹煞故事人物情节，而加缪写作恰是以“人”为核心，表达人的命运，虽然笔致素净，但并不淡化情节，而是静水深流，更不排斥传统小说里的情感描写。现今，“新小说”派已将文学引进死胡同，而这不是加缪之过。

罗布莱斯并不觉得他的故知一生无过，毫不为加缪饰非。他谈到二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激烈争论互不相让。他们俩都在阿尔及利亚长大，对那片热土怀有难以割舍的深切感情。但是，罗布莱斯谴责法国当局的殖民主义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争取独立的斗争。而加缪不肯放弃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建立普鲁东式“联邦”的念头，实质上反对阿尔及利亚民众渴望的独立，甚至公开渲染阿方游击队的“野蛮”和“残酷”，扬言“恐怖分子”威胁到他母亲的生命。社会舆论指责他只顾维护在阿尔及利亚的白人移民，混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位真正的“正义斗士”。待到阿尔及利亚独立呈现不可逆转之势时，加缪依旧不改变立场，固执地转以沉默对抗。

罗布莱斯眼见的加缪是个真实的人，没有一些崇拜者加给他头上的光环。恰恰相反，他眼里的加缪在夫妻关系上也远谈不上严肃，屡越“雷池”，给妻子芳西娜造成情感痛苦。罗布莱斯自己坚持爱情应该忠贞不渝，但是，他也没有指责加缪之意，只是同情芳西娜罢了。至于说到加缪“反共”，特别是“反苏”，罗布莱斯既不否认，也不认同其对国际共运全面否定的偏激立场。

于今蓦然回首，跟罗布莱斯谈起加缪的岁月已相当遥远。眼下，法国哲学界新秀米歇尔·翁弗莱出来破关关于加缪的“传说”。翁氏高调提出



法国画家亨利·马蒂斯作品《音乐》

世界文坛

SHIJI WENTAN